

蕭伯納絢爛一生（續完）

E. W. Kenworthy 作
高鳳英譯

歲入甚豐沒功夫花錢

蕭伯納之所以批評文明，其思想根源是在於社會主義，他寫劇的目的，也不過是在於宣傳他的社會主義而已，所以他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「社會主義者」。

他自詡研究馬克思主義，遠在列寧之前，史達林也曾對他自稱是馬克思的後生小子。他是在一八八二年聽了亨利·喬治的演講以後，又讀了喬治許多著作和馬克思的「資本論」，而終於成爲一個狂熱的社會主義信徒的。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極度發揚，也完全是蕭氏之功，在英國，蕭伯納無疑地是個社會主義的元勳。

一八八四年，他把全部精神供獻給於社會主義的工作。

蕭翁加入「泛平社」以後，力主社員的徵求，應重視質的精選，而不贊成量的濫增，這也是「泛平社」社務蒸蒸日上之主因之一。在社中他和韋勃分工合作，蕭翁專任對外的宣傳運動，韋

氏則負責內部的團結活動，兩人各展特長，相輔相成地發展社務，延攬了很多的名人。他們都以冷靜的學究態度和銳利的批評精神，致力於社會主義的研究發展。蕭翁以「偶像破壞者」的態度和懷疑時代的精神指導一切，於是，他們對於歷來的社會主義學說，漸漸懷疑起來，而終於揚棄了馬克思主義，背叛了歐溫的溫情主義，產生了他們的「泛平主義」。

關於「泛平主義」的內涵，蕭翁曾在「泛平論文集」序中指出：

一、消極的——「泛平主義」完全反對馬克思的「唯物史觀」、「階級鬥爭」和「勞動價值論」。

二、積極的——「泛平主義」主張天演的進化，緩漸的改革，合作的經濟，憲法治國，注重時代的需要，而不必遵守古老的傳統信條。

「泛平主義」的根本要點，大都和蕭翁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大出入。蕭翁的社會主義要點，是重視社會上貧富的懸殊，爲一切政治、經濟、法

律等等的社會均衡的鑒障，他認爲，對一切「生產」和「交換手段」，都交由社會公衆管理，而把總收入平均分配給社會衆人，纔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治本之道。

關於社會主義的前途，他說：「我相信，社會主義遲早必將會普遍地實行於世界各國，雖各國的革命手段與步驟各有不同，然而却是殊途同歸的。」

一般社會主義者，都視金錢爲社會萬惡的根源，但蕭翁則認爲：「經濟是利用人生的最好技術，愛好金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。」他在「巴巴拉少校」中，說得最爲透徹：「金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，『財富』是代表健康、體力、信義、慷慨和美麗；在不合理的社會裏，一部分人求之不得，一部分人則任意揮霍，所以金錢纔變成爲萬惡之源的禍害。『貧窮』所代表的，是疾病、懦弱、恥辱和醜陋，這些，也正是我們所應該攻擊的目標。」

蕭翁是個富有的社會主義者，他每年收入約

有八九萬美元。他說：「我沒工夫花錢，錢的功用只是使我得到安全，不受經濟壓迫罷了。假使社會能替我做到這兩點，我會把所有的錢扔到窗外去。」

一般社會主義者所稱的社會問題，多偏重於經濟和婦女這兩項，現在，我們再看看蕭翁的女性觀。

喜歡不像女人的女人

在他「鰥夫之家」裏的女性主人翁布蘭許，是個潑辣女人，而在「華倫夫人的職業中」的女主角薇薇，則是一位好學的姑娘，在她的心目中，世界上的一切，都受着金錢的支配；所以女性如果沒有正視「現實」的大勇和澈底的覺悟，是無法和男人一樣站在生存競爭同一戰線上的。在蕭翁筆下的薇薇小姐，是向新生活建設途上邁進女性的新典型。

對於女性地位的提高，他不但主張，女人要具有上述的勇敢精神和經濟觀念，而且還非要具有一種將近無情的理智不可。「好逮者」中出現的女性，都是致力於提高女性地位的「易卜生俱樂部」的會員；而她們都要具有「不像女人」的資格，始能獲准入會。其中的代表性人物，是急進黨的西爾維亞這個女性，她即使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，竟也不會掉下一滴眼淚。

他雖然主張女性經濟獨立，但是對於「不事正業」的婦女，則是極端反對的。他說：「在蘇聯，我見慣了各種努力於正當職業的婦女，她們自食其力地工作。但是當我路過波蘭的時候，却

看見一些粉黛妖艷的女人——打扮給人家看的女人，喝！我幾乎要喊巡警！」

蕭氏的女性觀和他的金錢觀一樣，也是有他獨具隻眼的特殊見解；尤其對家庭裏的女性，他更特別主張要爭取解放。她在香港的時候曾經對記者說：「家庭裏的女性，是一種奴隸，家庭中的男性，則是專制者的化身，於是，女人愈要跳出家庭的樊籠，男人則越愛要她們盤居在家裏。」事實上，他對女性却也不怎樣盲目地尊敬。

在上海的時候，他曾在「筆會」裏公然向男女賓客們說：「我向各位先生告辭了！」但是他又告訴訪問的記者說：「我本來是不十分喜歡旅行，除和女性同伴以外，任何旅行都是索然無味的。『可見他對女性的尊重，是有特別用心，是有着程度和分際的——他理想中的女人，是既能招待男人，而又能讓男人自由工作自由行動的女性。』總之，蕭氏的女性觀和金錢論一樣，都是迥異於其他社會主義者的。

把牛津劍橋鏟平了去

蕭翁既是一個富於機智而又怪僻的諷刺家，所以他的言論對於社會各方面是無所不見的；他對人類社會根本要素的「文明」批評道：「近代人類所努力造成的文明，不是『生』之力；而却是代表破壞的『死』之力。」

在「人與超人」中，他藉着惡魔的口舌說道：「倫敦有一個工人死了，他遺下子女七人和十七英鎊財產。而他的妻子却把這些錢，全部用於辦理她丈夫的喪事方面，然後，她帶着子女跑進

了養育院去，對於活的子女，她連半文錢也不留下。這樣不顧生者死活，而卻傾家蕩產地全力替死者辦喪事，便是近代文明的象徵。」惡魔又說：「人類在求『生』的技術方面，並沒什麼發旺，可是在找『死』的技術方面，則簡直勝過大自然，一旦遇着要殺戮的時候，人類所用的機械，可真够巧奪天工的；我曾看見拙劣的打字機，笨重的火車頭，沒意思的自行車，但是這些東西，在機關槍、潛水艇等相形之下，簡直都形同玩具了。」

他痛罵文明的人都是些可憐蟲，他漫遊世界回到倫敦以後的感想是：住在非文明國家裏的人民是够安適愉快的。

在對人物的品評方面，他也和普通人的觀察不同，而有他特殊的見解，他用「偶像破壞者」的態度，從事人物的批評——也就是首先應看不起別人，然後再盡力吹毛求疵，凡經過他所批評的所謂英雄偉人，都變成了另一種粗淺的凡夫俗子。

例如他批評馬克思說：「他雖然是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，然而却並不是經濟學家，何以見得？因為，他主張以經濟為武器抵抗敵人，他的價值論，是一種不難攻破的謬見。」他對甘地的批評則是：「他的非武力『無抵抗』主義是不對的。要知道，所謂『人』之為物，即使他所有武器全被剝奪精光，如果決定要抵抗的話，無論條件怎樣壞，都是可以抵抗的——因為我們還有兩拳可以抵抗一切……」

蕭翁對教育的評論，更是極盡尖刻之能事，

他的教育觀完全以一種天賦自由思想作基礎的。他對於學校教育，始終沒有好感，他曾經說道：「世間的兒童，凡是得稱為愛學校的好學生，都是那些敬畏父母尤甚於怕師長的孩子。以我本身而論，爲了要保全我腦筋的機能，在上課的時候，我總是把一本小說放在地理書下面偷看。」他之憎恨學校，是因為當時的學校，除了教拉丁文和希臘文之外，是沒有其他功課的。

「牛津」和「劍橋」應該算是英國最有名的最高學府了，但是蕭翁則認為，這兩所大學是最貴族化的資本主義學校，所以他極力排斥。英國許多大學都曾邀請他演講，但是他却獨獨拒絕了「牛津」和「劍橋」的聘請。在他底心目中，像「牛津」和「劍橋」這種大學，是過時的，是不值得保存的，他說：「對付這種一無是處不值得尊敬的學校……不管他們的建築怎樣富麗堂皇……惟一的辦法，就是把它們剷平，再在基礎上面撒上鹽粒。」（譯按：「撒上鹽粒」是英國人用以僻邪的一種習俗。）接着他又說：「文化所需要的是創造精神，……所以大學學生，決不能死記着從課本上所得的學問，而是要盡畢生歲月實踐學問的意義，所以學生必須時常向老師請益，或是和老師討論，更進一步的探求師長不同的見解，則自然能發現學問的意義，求學之道，在於善用組織法探求真學問的價值。」

蕭翁對宗教評論的尖刻程度，也無殊於對英國教育的批評。他十四歲時聽了美國著名牧師傳教以後，曾經大喊道：「他們所說的如果是基督教義，那末我就是無神論者了。」他也曾寫了一

封反宗教的公開信，力主無神論，當時他和傳教士的對話是這樣的：

傳教士：既然有宇宙，當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。

蕭伯納：既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，當然也另有一個創造這創造宇宙的人的人嘍！

他不信有上帝的存在，即使他承認有「上帝」這回事，他也以為上帝不祇限於一個；他也不相信上帝是完全的，所以他說：「說是世界上祇有一個上帝，這完全是耶穌教徒騙人的鬼話，人類自有史以來，不知遇了多少上帝；而且所有所謂的上帝，又都是後來居上地一個比一個強。但是一直到現在，總還沒有一個上帝是完全無缺的。」

有一次，當他在羣衆面前演講宗教問題的時候，他大聲說道：「請你們互相環視一下，想一想，假若上帝有能力把你們造好一點，他會讓你們成這個樣子嗎？」

他大膽地稱耶穌是革命理想家，並且以社會主義的精神，把耶穌的教義下了一種概括了四條的新的詮釋，其中第二條是：「廢除產業，併入公家。你的工作應全脫離酬勞的關係。如果你讓着一個小孩挨餓，便是讓上帝挨餓，撇開一切關於明天衣食的計劃，因為你不能服侍兩個主人——上帝與財神。」

批評中國人不太客氣

第四條是：「廢除你的家庭牽累。凡天下的母親都是你的母親，天下的人，都是你的同胞兄

弟。不要爲了喪事而荒廢光陰，要注重生，不要注重死。海中的魚和灘上的魚一樣好，天國是在你內心，而在天國中是沒有嫁娶的，因爲你一生不能服侍兩個人——上帝和你所嫁娶的人。」

蕭翁對耶穌的觀察如此深刻，對上帝的概念又如此澈底，所以他的宗教觀，是根本不相信有萬能的神，而認所謂神是盲目衝動的力量，在不斷走着錯路前進。這就正是他所謂「創造進化」的觀念之一。

第一次大戰於一九一四年，爆發之初，蕭翁便激烈反對戰爭，堅決地保持極理智的冷靜態度，他大聲疾呼：「戰爭要把人類帶回野蠻的境地，黷武主義者是強迫人民納更多的稅，好去增進殘殺的效能；最後的結局，祇有將文明毀滅。」

他看到歐洲民衆在飢餓、瘟疫和兵災交相煎迫之下，還要被迫到前線去參加殺戮，犧牲在槍林彈雨之中，因而表示無限的同情和悲憤，雖然在四面楚歌聲中，他始終爲正義人道而反對戰爭，他搜集了許多資料，寫了三個劇本諷刺戰爭，劇中有很多詼諧而惡毒的句子，如：「這是救濟文明的戰爭！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！」

談到防止戰爭的釜底抽薪之計，他說：「必須各國真正立定謀求生存與和平的決心。因爲人民根本不需要戰爭。國際聯盟裏有一個『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』，假如世界上智識份子能够利用這個機關，大家聯合起來反對戰爭，也許比另外組織一個會議來得更爲有效。」然而今天的聯合國對於防止戰爭，却仍然束手無策。

蕭翁是一種新興階級的擁護者，是反帝國主

義的作家，所以他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是極表同情的。

在印度的時候，印度記者曾經以關於印度的問題見詢，他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印度問題，在我看來根本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；在大英帝國領土裏，印度不是擁有最多的人民和土地嗎？所以英國不久將對它發生厭煩，到那個時候，英國一定會對印度人說，請你們大家隨便獨立好了，就這樣做去罷。」當這話傳出去以後，印度總督警告他說：「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，不要干涉印度政治，胡說八道！」

他曾經在香港批評香港說：「香港真是個可罵的地方！」當記者問他，到菲律賓的時候，是否好像有了美國的感覺，他的答覆是：「奇怪！菲律賓怎麼能說是美國呢？試想，美國豈不是已經表示討厭，而在極力設法使它獨立？」顯見蕭翁是極力主張殖民地獨立的。

談到他的出生地愛爾蘭，他也是認為應該以脫離英國為最合理的。他說：

「愛爾蘭人的民族運動，使英國傷透了腦筋，英國幾乎有三十年無暇顧那末許多了，但是在國會來說，那却也是無可奈何的事……今後，英國說不定會有主動要求愛爾蘭獨立的一天。英國所擁有領土的面積，在已經超過它本身的幅員，起初，是狗搖尾巴，等尾巴長得太大的時候，尾巴將要搖狗，到那個時候，狗也將求去之不得了！」他雖主張愛爾蘭獨立，但是對獨立黨領袖瓦雷拉所採的政治步驟，却表示反對，他說：「瓦雷拉開了半天，並沒弄好什麼，那或許是因為

愛爾蘭的政治制度不良——舉出五十個人來治理國家，又另選出五十個人來制止這五十個人的運動，以致他們根本無法把政策付諸實施。」這就是蕭氏對殖民地的一種看法。

蕭翁對中國的看法，也正一如一般歐西人，他有關中國的知識，也是得自馬可孛羅「東遊記」的薰陶。當途經上海的時候，他曾經和記者談到「滿洲」問題，他問記者溥儀究竟是怎樣一個人，他表示，他祇是從溥儀的教師莊士頓那裏，聽到一點有關中國的事情，他承認自己對中國一無所知。

可是他又對記者說：「滿洲問題，我沒有資格談論，現在對東方問題有研究的英國人，恐怕祇有李頓一個吧；但是我只讀了兩章李頓的報告書，就覺得深奧極了。」這位機智的聰明人，因為對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情形不太明瞭，而不得不用技巧來應對有關問題，所以記者提出的每個問題，都被他含糊兩可的對答敷衍過去。

他曾對中國人的利己劣根性，有過這樣的批評：「在北平的中國闊佬，都紛紛南遷，好像北平可以放棄，而富人的財產却不能受絲毫損失似的，我不懂這是什麼道理，難道富人的財產，比北平全市的價格還高不成？」接着他又說：「中國人的奇怪特性是，對一切外國人是那樣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，而對自己人却老實不客氣地經常打仗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？中國人不是和具有高尚知識的人們一樣，在賦策方面也是超人類的，因而厭惡了這包括他們在內的人類？」這大概是當時他看到中國還不會安定的社會有所

感而發的評論。

蕭翁當時所發表有關日本的言論，都含有深刻的諷刺寓意。當談到日本的國民性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文化發達的國民，對任何一件事，都容易發狂，同時也容易冷靜——這種國民是具有健忘性格的，英國人這樣，日本人也是如此。」

當蕭翁作琉球旅行的時候，恰為正當日本藉故侵略中國，他曾對記者批評，左右中、日兩國態度的，是兩國民族性的差異。他說：

「中國人酷愛和平。日本也有稱酷愛和平；日本嘴裏所喊的和平，是戰爭終止後的和平，而中國人的却是和平中的和平。日本會向國際聯盟表示，保護所謂的「滿洲國」，是日本人無可旁貸的責任，至於侵略熱河的行動，則聲稱是保護所謂滿洲的屏障；以保護之名，而行侵略之實，而且自認為是自衛行動。中國本來採取不抵抗主義，現已覺得不適用，便於是改變為抵抗主義，這纔是真正的自衛行為，而日人在中國領土上所作之「自衛」，又真是從何說起？」蕭翁這些對世局所發表的意見，也不失為幽默中的諷刺！

利用戲劇宣傳其主張

身兼社會批評家的蕭伯納，對於社會各種問題所採取的諷刺態度，以及所抱持的錯綜廣泛思想，已經撰為專文介紹。現在，我們再看他的「根本思想」或是「人生觀」究竟如何。

蕭翁心地開朗，目的純正而且人生觀豁達，

不羈，他曾經說這樣的話：

「合理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，不合理的人則使世界適應他自己；所以一切進化，都是由不合理的人推動的。」

以上所引述的這段話，當不難窺見蕭翁「人生哲學」的一斑。至於不合理的人之所以能這樣有勇氣去做，蕭翁認為，宇宙間有一種意志力量存在着，世界之所以進化，也就是「宇宙意志」推動的結果。這種「意志力量」，蕭翁稱之為「生命力」。

關於「生命力」的功能，蕭翁說：

「生命力不但是追求着結合適配的婚姻，藉以產生偉大純潔的種族——超人。在社會上所有的教育以及民主政體，都是社會主義的最基本表現。人類因促進種族繁衍而選擇社會運動，也正是人類進化的表徵。」

他的意思是應以「生命力」為改造社會的原動力；用前進的改良方式，使人類達到「平均收入」、「平均分配」的大同境界，使人人過着和平安適的生活，而不用訴之於激烈的共產主義。

總之，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所謂「生命力」；以「生命力」為他的一切活動根源——這就是他的「人生觀」（人生哲學）。

他的「生命力」哲學的意義是這樣的：

宇宙間有一種人們意志所不能左右的「生命力」。這種生命力也正是人類社會裏進步和種種活動的原動力。可是後來，由於人類社會裏的種種阻碍，因而直到現在，「生命力」還不能達到完成它自身的境界。現在，大家正在致力於達到「較高的組織，和較廣、較深、較強的程度，

以求能達到滿足自己某種意志，以及較透澈自我理解」那種境界。如果「生命力」一旦和最輝煌的知識相結合，則可以產生進化的人類，最後還可產生比現在人類更優越的「超人」。人類如果到達到了「超人」的境界，理想的社會纔可望實現。

換句話說，蕭翁的人生哲學，是專注於積極方面的，他主張個人的「精神革命」，以及「心理的改造」。他相信以「生命力」來推進個人的意志，纔可以把人生從黑暗引導到光明之路。在他的心目中，這種光明之路，纔是人生真正幸福人生的終極境界。至於達成這理想的境界的途徑，則在於開發「人類理智」，以擴展這種「生命力」。

蕭氏所寫的戲劇題材，是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中的某些富有意義的事物，或是能反映社會問題的事物，他把這些事物和社會問題搬上舞臺上，加以剖析，以說明其根本意義。這就是蕭伯納的戲劇。

蕭翁的戲劇，也正一如易卜生的戲劇，也是以「論議」的形式貫徹始終的，所有的登場人物，都是喜歡討論問題的人。例如，「結婚」雖然祇是獨幕劇，但却要上演達三小時之久；劇中自始至尾，都以結婚做為論戰和剖析的中心問題。在這齣動作少而議論多的舞臺劇裏，他很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幽默、諧謔、諷刺和警句加以適當的穿插點綴，使觀劇的人不但不覺得枯燥無聊，反而感到趣味盎然。

在他的戲劇裏，凡是令人意蕩神迷甜蜜的戀愛情景，濃上柔間，風光旖旎的場面，是無法看得到的，他是故意避不刻繪這些男女之私的情節

。因為他認為陶醉的情景，或是恍惚的境界，都足以令智力陷於催眠狀態的，因而會窒礙了欣賞者對於劇中重要精神活動的理解。這也是蕭劇內容的特色之一。

因為他是利用戲劇宣傳他的主張，借劇中人物解釋他的思想，所以在每齣劇的前面，都有很長的一段解釋他主張和態度的序文，因此有人說，不知是蕭翁為了劇本而寫作序文，還是為了序文而寫作劇本。同時，他並且還在劇本後面附加後記或註釋之類的文字，以解釋他的序文，並補充說明劇情不足宏揚他思想的部份。

顯見蕭翁的戲劇，實在是論文或演說辭，或是評論的色彩重於戲劇的，劇中人祇不過是表達他這位劇作者的意見的播音機而已。所以就戲劇本身而論，蕭翁的劇本，並不是人物的結構，而是各個人物意見的結構；因此，劇中的故事，也不是人物的鬭爭，而却是意見的鬭爭。

此外，蕭劇在舞臺指導方面，也寫得特別繁瑣，例如「怒氣勃勃的」，「堅忍不屈地」，「回憶的樣子」，「很當心地察看四周」等等，都是些冗長而多餘的話。

蕭劇的特質，不但「序文」、「後記」、「註釋」和「舞臺指導」的文字，令人有長篇大論之感，就是劇中的對白，也都嫌過於冗長，而缺乏舞臺動作的配合，不過蕭劇所有的劇本，却都洋溢着不可企及的機智，以及社會問題的強烈反映，和妙趣橫生而極盡諷刺之能事的幽默感。

總之，蕭翁的戲劇，是他解釋本身主張的一種方式，也是他致力於他理想社會主義宣傳的一種工具。